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探析

程 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0)

[摘要] 本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四个历史时期为分水岭,梳理了其先后呈现出的兴起、迟滞、重兴、创新等特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紧密联系,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进性、与群学的亲和性解构其顺利中国化的原因,以期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时代回应。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国化

[作者简介] 程萍,女,江苏涟水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数智化时代高职院校‘精准思政’改革探索”(项目编号:2024BSKY26)。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103001>

[中图分类号] C91-0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产物。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深度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理论体系逐渐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逐渐彰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阐释中国经验”的时代使命更加艰巨。鉴于此,有必要梳理其百年发展历程,在分析思辨中增强理论自觉和范式自觉。

一、出场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出场形态蕴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维度。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由工业革命或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动的自由竞争阶段,空前残酷的阶级压迫激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社会的思考,探寻实现社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方法。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在其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首次提到“社会学”一词,针对性地对其概念进行详解及学科框架构建,社会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并在争鸣探索中,逐渐形成了韦伯取向的社会学(或称解释社会学)、涂尔干取向的社会学(或称实证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称批判社会学)。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被称为社会学真正意义上的三位创始人,或曰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引导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科学,其从哲学角度分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待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开放性、科学性、全面性及发展性。其主张以唯物史观为研究角度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变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进行社会建设,不仅严谨客观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矛盾及带来的发展弊端,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深刻批判,而且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在对历史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及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展望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凭借明确的引导性、先进的理论性及科学的实践性,不仅使其在经典时期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形成了明显区别和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而且也使其在经典社会学之后的发展历史中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其理论内容和文化内涵被许多社会学家及后继者扩充与延伸,在各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实现了本土化,构建和呈现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俄国,形成了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形成了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欧洲,出现了以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或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二、发展历程:兴起、迟滞、重兴、创新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主张,不仅要批判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依据“旧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类型,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历程简要概括为两种,即“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二者既不同又统一,“革命批判性形态只是它的一种过渡性的、预备性的形态,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遵循这一脉络,本文结合细分的历史时期进行梳理,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维护建设性形态社会学在中国的崛起和新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兴起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萌发,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在寻求救国图存之路的过程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国化的最主要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极为重要的开创者。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归纳法作根据”而具有科学的精神,因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来进行宣传的。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中提出,社会学得到唯物史观这一重要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俾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会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没有把历史唯物论划归哲学,而是划归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为他认为,哲学是研究社会思想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读书储能观、社会改革观、阶级斗争政治观、革命实践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犯过“左”或“右”的错误,但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探索中国社会区别于俄国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最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中华民族随着新中国

的成立迎来伟大复兴的曙光。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宣传与推广,实现了由部分地区特殊发展到全面范围内普遍发展的有效转变,由机械式、教条化使用到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灵活化应用的有效转变,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历经了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单独理论研究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迟滞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但中国社会学还是遭遇了近30年的禁闭:在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中,社会学系的相关专业被撤销或合并到其他专业中,社会学的相关教育工作者也被调往其他专业领域,不仅西方社会学思想被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很少被提及和研究。

然而,虽然这一时期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中断,造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层面的“失声”,但就实践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其实并没有“离场”,主要表现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关于稳定社会运行、消除社会矛盾、规范社会秩序、维护人民利益、处理阶级关系的相关问题,坚持以辩证的态度、开放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待社会发展,注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寻求脱离社会困境的对策。换言之,毛泽东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特点,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可以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与延续的重要象征,毛泽东思想代表着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兴阶段

1978年之后,随着社会学的学科恢复与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缓慢起步中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作出学科回应,确切地说,其以“建设一个新世界”为皈依的“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相较而言,前者因为历史原因基础薄弱,明显滞后于后者。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探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系统性并不太强,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借鉴历史

学研究范式,结合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时代背景,考证早期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渊源,梳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独特贡献。二是在学科建构和发展视域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性学理问题的研究,如对历史使命与学科地位、基本思路、理论辨析、研究对象、社会模型(即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重点、社会功能等的探讨。三是对学科本土化的专门探讨,比如陈国庆、李巾运用历史分析和归纳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概括;姜方炳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而“文化自觉”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现中国化的一种必需;吴平清指出,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缘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郑杭生呼吁系统、深入地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澄清对它的偏见和片面理解;刘少杰重点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薄弱的原因,提出应明确认识其本质特点和历史地位,在空前有利的机遇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

与此同时,党的第二、三、四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灵活应用的重要象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种自上而下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倡导和应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有效的学术动员。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阶段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地对新挑战与新机遇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以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和明确的指导,在实现创新与守正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于历史比较,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总体来说内在细胞得到一定激活,“现场回应”越来越积极,在问题意识、分析视角、研究方法、理论构建等多个层面呈现较明显的转型与提升。

景天魁、赵万里、张明波、刘少杰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进行的脉络化、全景式、宏观性梳理,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研究,在学界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可。沿着这一轴线,学者们在更广阔的视阈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出发进行了展望,如沈东深入剖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清冷低沉”的原因,主张应加强面向实践的“进行式、未来时”的“增量理论”生产。与此同时,一些交叉性、应用性、创新性研究开始出现,开始彰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广泛适用。

三、发展动因:先进性与亲和性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最重要、最坚定的力量源泉,除此以外,还有两大原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以其实践论的基本立场、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超越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打通了实证与理解的藩篱。涂尔干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指出应根据社会事实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及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并主张将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区分开来,在分析自杀、宗教等社会现象中取得重要成果,在推动社会学成为独立的基础学科方面做出重大贡献。韦伯在社会学研究中以人的社会性行动作为核心,认为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由无数的人组成,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行为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在社会建设中应高度重视人的作用,在保持社会学客观中立的同时从人的主观视角分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批判作为重点内容,其对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指出其理论中的不足之处并肯定其中的先进理论,由此架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将社会的客观现实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联系在一起,反对涂尔干不变革社会关系的主张,指出当前的阶级矛盾是造成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该问题必须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阶级斗争,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对韦伯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针对性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形成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优先作用,重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这种最深刻、最彻底的批判视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全面性、优越性、先进性和发展性,这种鲜明特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流传至今并迅速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亲和性

群学是我国的古典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之间存在较高的亲和性,这是其中国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其一,两者在群众观点方面具有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人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动物,即其处在社会现实中,组成并影响着社会关系,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独立的个体才能产生相互的联系,社会关系才能汇总成为整体的社会。这种观点与群学中的“人之生不能无群”高度契合,人之所以能为人,主要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通过社会关系产生了群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群学均强调社会关系对人的重要性,认为要从群体角度来分析人、理解人。其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群学“以民为本”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同向性。马克思指出人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创造历史、发展历史、改变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发展好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资本主义思想引起的阶级矛盾,要进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等传统思想影响着群学的发展,群学把“民”作为“群”的基本组成部分,认为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群”要强大必然要爱“民”,兼顾每个“民”的利益,为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民”要更好地生活、实现自身的人身价值,需要去“合群”“能群”“善群”,在此基础上做到“乐群”。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都重视群体与个人间的公私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影响的,只有协调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才能高效取得社会利益,对资产阶级独占和垄断生产资料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判与谴责,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群学受中国传统“崇公”思想观念的影响,主张先公后私,即将群体利益放在首要地位,鼓励人们树立利他主义的群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公私观和群学的群己关系都强调公共的利益,具有一定的亲和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的高度契合使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坚实的思想基础,一经传入就被中国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研究与探索,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迅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该进行持续的探索与完善,保持自身的“与时俱进”。立足两个大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面临更多时代性课题,需要继续加强中国化、时代化探索,进一步钩沉、发掘和深耕。

参考文献:

- [1]王力平.出场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再诠释[J].社会科学辑刊,2014(2):47-51.
- [2]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0(2).
- [3]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9(5):78-99,206.
- [4]郑杭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11-15.
- [5]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卷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6]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N].光明日报,1985-7-29.
- [7]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8]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9]李羚.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社会学史探源[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21(2):15-25.
- [10]周一平.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1-7.
- [11]王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学科地位[J].中国社会科学,1995(2):195-196.
- [12]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思路[J].社会学研究,1989(3):46-56.
- [13]张向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辨析[J].社会学研究,1986(4):107-113.
- [14]王训礼.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J].临沂师专学报,1988(2):1-7.
- [15]常向群.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模型——社会经济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1989(1):203-206.
- [16]于光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与当前研究的重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1(4):5-11.
- [17]郑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预测功能[J].社会,1984(4):3-6.
- [18]陈国庆,李巾.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60-64.
- [19]姜方炳.“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0(4):51-55.
- [20]吴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12(3):9-14.
- [21]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与机遇[J].江海学刊,2008(5):124-131.
- [22]刘国胜,肖霞.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逻辑[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0(5):20-24.

[23] 赵锋. 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及其社会学问题[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3): 116-129.

[24] 王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J]. 甘肃社会科学, 2005(1): 120-122.

[25] 孙旭, 孔扬. 马克思对涂尔干现代社会道德与价值共识重建的超越[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7): 246-251.

[26] 景天魁, 高和荣. 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 100 年[J]. 社会科学战线, 2021(2): 33-47.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CHENG P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Maritime Institute, Nanjing Jiangsu 21117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century-ol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and taking the four historical periods as the watershed, this paper sorts ou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rise, delay, revival and innovation,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and focus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reasons for the smooth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sociology from its advanced nature and affinity with group stud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sponse of Chinese Marxist sociology to the times.

Key words: Marxist sociology; development; sinicization